

【 中国近现代
高等教育研究
丛书 】



周川◎主编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 高等教育

洪芳◎著

DAGONGBAO YU ZHONGGUO JINDAI
GAODENG JIAOYU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013068252

G649. 29
60

周川◎主编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 高等教育

洪芳◎著

DAGONGBAO YU ZHONGGUO JINDAI

GAODENG JIAOYU



G649.29
60



北航

C1675795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洪芳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8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周川主编)
ISBN 978-7-5334-6203-1

I. ①大… II. ①洪… III. ①《大公报》—关系—高等
教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649.29②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0473 号

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周 川 主编

洪 芳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出 版 人 黄 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 刷 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 151 号 邮编: 350082)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173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6203-1

定 价 25.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序

周 川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中后期，下限大约在20世纪中叶，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一个世纪，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动，这些对立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重大社会转折期特有的矛盾，也决定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特殊的发展道路。一方面，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登峰造极的种种矛盾和乱象，例如旧北京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此起彼伏的校长风潮、校名风潮、索薪风潮、“脱部”风潮，当然还有军阀政客对高等教育的恣意摧残和蹂躏等等。另一方面，也正因为环境的艰险，反而映衬出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任何一点进步和成就，更显得来之不易；筚路蓝缕的先驱者们为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更显得不同凡响。例如，为了维护大学自治和自由，儒雅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面对北洋政府的淫威，挺身而出向全社会宣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又如抗战期间，许多大学颠沛流离，师生饥寒交迫。西南联大像梅贻琦、闻一多那样的名校长、名教授也不得不靠售卖太太的女红或是代人刻章以维持生计。然而，在那样的艰难困苦之中，师生们却

“同艰难、尽笳吹”，修业乐道，弦歌不辍。难怪李约瑟盛赞，那些为避战火而迁徙到深山里的大学，简直就是“东方的剑桥”。在李约瑟看来，如此艰难环境中办出如此成就的大学，不啻教育的奇迹！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这矛盾的两极之间艰难地孕育和发展。在那里，我们既能看到忠君尊孔和“党化教育”方针，又能看到“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学术纲领；既能看到战火延绵、政局动荡而造成的乱象，也能看到应规蹈矩、循序渐进的井然有序；既能看到“封建、买办、法西斯教育”的阴影，又能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看到科学、民主、自由力量的生长和种种教育奇迹的涌现。

环境动荡艰险，道路曲折坎坷，内容丰富多彩，成败泾渭分明；这就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为后人留下的一笔独特的历史遗产。这笔历史遗产，无论是“教育的奇迹”还是乱世的牺牲，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它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意义的典型案例，也是中国近现代特殊社会性状的真实缩影。然而，对这笔历史的遗产，我们显然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认真系统地加以总结，因而对它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所知甚少。今天，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更多的是那个特殊年代大学内外的种种“故事”和“掌故”，还有许许多多的“奇闻轶事”。故事多，轶闻多，说明了这段历史有丰富的内容，有流传的价值，最起码说明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新鲜。但是，我们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故事”的层面上来继承这笔历史遗产，也不能仅仅以讲故事的心态来对待它。这笔历史遗产的珍贵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构成了一个内容极为丰富并且极具挑战性的研究领域，需要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和理性的工具去爬梳整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还原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本来面目，揭示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这个特殊案例的真谛，以进一步丰富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另一方面，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昨天。不管我们是否正视它，也不管我们如何对待它，它都是历史的存在，都是今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前进路标，是今人可以对照的一面明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研究这一段历史，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弘扬优良传统、避免重蹈覆辙，也不失其现实的意义。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苏州大学“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和

省级重点学科为依托,组织相关方向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撰著了这套“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丛书。这套丛书肯定无力承担系统总结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经验教训这样宏大的主题,它只是选择了这段历史中几个具体的点或线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旨在厘清事实,还原真相,描绘路径,透视背景,分析因果,评价功过,论证意义。即便是这样,对于大多侧重于教育学背景的各位著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性的高难度目标。但是,我们坚信“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古训,坚信了解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对于当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深远意义,同时我们也坚信: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以勤补拙的态度,发扬钻研精神,愿花大力气,肯下笨功夫,我们的这一工作就一定能取得钝学累功的效果,也一定会产生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敢于不揣浅陋,将这套丛书奉献在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问题的读者面前。

二

洪芳博士所著《〈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以《大公报》这份独特的报纸为研究资料,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及其与传媒关系的一部专著,是著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著者运用文献分析的方法,系统查阅了1902年6月至1949年初所有的《大公报》,对该报此间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报道和时论进行分析和归纳。以此为基础,该书梳理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若干重要制度和举措演进的历程,描述了近代高校学生和高校教师的群体形象,还原了近代高校某些管理事务的复杂关系和人情底里,并以相关的传媒理论为框架,探讨了《大公报》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阐释了《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双向互动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构机制以及对“现代性”的诉求方式。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大公报》发行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很少有其他的民间报纸可以比肩,这与它追求“四不”办报宗旨,且致力于“牖民智”、“通民情”、“鞭挞权贵”、“批评时政”,肯定有内在的关系。这样一份独立的民间报纸,对当时的高等教育情有独钟,始终将高等教育活

动作为重要的报道领域。据书中统计,《大公报》创刊后的第一年内,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类报道就不下二百五十余条,几乎天天都有高等教育的消息,“而且事无巨细,上到高等教育制度,下到京师大学堂浴室、车棚的兴建,都给予了全方位的记录。”之所以如此关注高等教育,除了《大公报》秉持的“文人立场”之外,可能也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政局的跌宕,社会的转型,民族的危亡,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各种各样预料不到的难题,同时也将高等教育推到各种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上,使高等教育领域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成为名副其实的是非之地。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高等教育对媒体也在发生影响和作用,而《大公报》从其“文人立场”出发,似乎比别的报刊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风向。

这本书的重点,显然在于探讨《大公报》这一特定的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或者说是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窗口来透视当时的高等教育,探讨当时历史条件下报纸对于高等教育所能发生的作用。该书在分析《大公报》形形色色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论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了《大公报》作用于高等教育的主要方式,诸如“揭示”了重要高等教育制度的出台过程,“记录”了各种高等教育事件的真相,“反映”了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所持观点的分歧和冲突,“分析、评论、解释、探讨”了高等教育的各种现实和理论问题,等等。因此,书中认为《大公报》对近代高等教育,实际上起到了论争“平台”、“舆论导向”、“塑造形象”、“批评”督责的作用,它是高等教育事件真相的“揭示者”,是社会各界关于高等教育问题的“沟通平台”和“话语空间”,甚至还偶尔充当了高等教育某些矛盾的“调停人”。

《大公报》之所以能对高等教育起到这样的作用,想必还是和它所追求的“四不”方针有关。只有站在中立、公正的立场上,直面高等教育的问题,揭示高等教育的矛盾,秉笔直书,百家争鸣,它才能真正成为争论高等教育问题的“平台”和“空间”,成为高等教育有力的批评者和督责者。从本书对《大公报》各类高等教育报道和时评内容的归纳来看,这些报道和时评虽然也有“褒扬”,有“宣传引导”,有“正面形象塑造”,但是,更大量更经常性的,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和矛盾的“揭示”,是对高等

教育负面现象的直接批评和督责。

在这些“批评”类的报道和时评中，首当其冲的是对校政和体制的批评。如1926年11月1日刊文揭露“北京大学不能开课之原因”，除经费问题外，“尚有内幕在”，实“学校行政腐败之结果”。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育官员“从盘根错节而来，亦依阿如官僚，圆滑如政客，无抱负，无勇气，徒知敷衍应付，冀以乡愿资格，久保高位，而不知因循放任之结果，不但学款虚糜，助长腐化，流毒所及，乃至断送青年命运，戕贼国家命脉”。如1935年7月15日刊文批评校长，“中国大学教育所以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以往的大学校长们太不肯负责任”，“因为他们大都是些官僚政客。他们办大学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想藉此发展或保持他们的势力，以作他上政治舞台的阶梯”。其次，也有大量的批评教师和学生、抨击不良教风学风的文章。如1930年10月5日刊文，批评教师“旧习已深，成见过重，党同伐异。各恤其私，旁鹜兼营，心神不属”；1923年1月8日刊文痛批“学阀”：“今日之学阀，其勾结军阀财阀，而摧残吾国教育之生命”，以至叠有“北大讲义之风潮”、“高师校长风潮”、“法专校长风潮”、“农专铁血团风潮”、“警官校长风潮”、“保定师范风潮”等等。又如1907年4月13日刊文揭露“法专学堂学生花天酒地”，5月6日登载学生呈学部禀揭露同学中“挟私舞弊，考生找枪替”之现象，1922年12月23日刊文抨击学生“学风嚣浮”等。这些批评的文字，开门见山，针砭时弊，有一针见血、振聋发聩之效果，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对高等教育起着某种监督、督责的作用。我们今天读来，又何尝不触目惊心！

该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著者在通览1902年6月创刊至1949年初所有《大公报》的基础上，对有关高等教育的报道和时评进行细致的爬梳整理、分析归纳，通过《大公报》这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事项、重要论争的来龙去脉和人情底里，并从理论上探讨了媒体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用。这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具有鲜明的学术意义和史料价值，可喜可贺！当然，媒体与高等教育的双向互动，乃至高等教育“公共空间”的建构，又不仅仅只是媒体与高等教育双边的关系，而是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气候的，是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书中所探讨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

这样一种关系，就是在当时独特的中国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由当时独特的社会状况所决定的。对这种社会条件的探讨，应该是著者在后续的研究中需要加以重视的。

2013年5月31日

目 录

引 言	(1)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演进及方法的更新	(1)
二、选择《大公报》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及其已有研究成果	(5)
三、研究思路	(9)
四、创新点和不足	(11)
第一章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	(12)
一、《大公报》中有关高等教育制度的展示和讨论	(13)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演进历程	(41)
三、《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形成之关系	(47)
第二章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学校学生	(54)
一、《大公报》中的学生形象	(54)
二、学生群体的现代特征及其发展历程	(87)
三、《大公报》与学生形象塑造之关系	(93)
第三章 《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校教师	(99)
一、《大公报》中教师的角色形象	(99)
二、中国近代高校教师角色特征	(111)
三、《大公报》与教师形象塑造	(114)
第四章 《大公报》与高等学校事务	(117)
一、《大公报》中所涉学校事务	(117)
二、中国近代高校学校事务管理的特征	(149)
三、《大公报》在高等学校事务讨论中的角色	(152)
结 语 双向互动中的公共空间建构	(156)
一、《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现代性”诉求	(156)

二、双向互动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159)
三、未完成的“现代性”	(162)
主要参考文献	(165)

录 目

(1)		宣 序
(1)		一
(2)		二
(9)		三
(11)		四
(81)		第一章
(81)		一
(11)		二
(31)		三
(15)		第二章
(15)		一
(38)		二
(48)		三
(99)		第三章
(99)		一
(111)		二
(111)		三
(111)		第四章
(111)		一
(111)		二
(111)		三
(111)		四
(111)		五
(111)		六
(111)		七
(111)		八
(111)		九
(111)		十
(111)		十一
(111)		十二
(111)		十三
(111)		十四
(111)		十五
(111)		十六
(111)		十七
(111)		十八
(111)		十九
(111)		二十
(111)		二十一
(111)		二十二
(111)		二十三
(111)		二十四
(111)		二十五
(111)		二十六
(111)		二十七
(111)		二十八
(111)		二十九
(111)		三十
(111)		三十一
(111)		三十二
(111)		三十三
(111)		三十四
(111)		三十五
(111)		三十六
(111)		三十七
(111)		三十八
(111)		三十九
(111)		四十
(111)		四十一
(111)		四十二
(111)		四十三
(111)		四十四
(111)		四十五
(111)		四十六
(111)		四十七
(111)		四十八
(111)		四十九
(111)		五十
(111)		五十一
(111)		五十二
(111)		五十三
(111)		五十四
(111)		五十五
(111)		五十六
(111)		五十七
(111)		五十八
(111)		五十九
(111)		六十
(111)		六十一
(111)		六十二
(111)		六十三
(111)		六十四
(111)		六十五
(111)		六十六
(111)		六十七
(111)		六十八
(111)		六十九
(111)		七十
(111)		七十一
(111)		七十二
(111)		七十三
(111)		七十四
(111)		七十五
(111)		七十六
(111)		七十七
(111)		七十八
(111)		七十九
(111)		八十
(111)		八十一
(111)		八十二
(111)		八十三
(111)		八十四
(111)		八十五
(111)		八十六
(111)		八十七
(111)		八十八
(111)		八十九
(111)		九十
(111)		九十一
(111)		九十二
(111)		九十三
(111)		九十四
(111)		九十五
(111)		九十六
(111)		九十七
(111)		九十八
(111)		九十九
(111)		一百

引 言

麦克卢汉认为：“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于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①作为社会活动之一的教育也不例外。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与传媒的联系和接触中发展变化的。然而，大众传媒是怎样塑造和架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有怎样内在的关联？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缺乏应有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本书旨从传播学的角度，选取《大公报》作为典型，希冀对这些问题作一系统的剔抉和爬梳，以重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观念并理清其准确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的演进及方法的更新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的不断更新和突破中，向纵横两个方向延伸和拓展。可以说，每一次研究成果的推进，往往是新的研究方法探寻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人们首先用阶级的观点去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探讨阶级斗争对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制度的影响。当时有研究者认为，“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阶级的。因此必须用阶级的观点来观

① 徐耀魁主编.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 [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95.

察分析一切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①当研究者超越了简单的阶级论和单纯的政治评价之后，更多的研究者将视角还原到教育过程本身。在对教育本体的研究中，许多过去被忽视或较少研究的领域，开始得到较多关注。然而，教育毕竟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教育的发展和变迁与社会、文化等发展和变迁紧密相连。因此，在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又融进了文化研究和社会研究，多角度、多方位地审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和史料挖掘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该说，把大众传媒引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建立新的分析框架，会拓展研究的视野，加深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认识。笔者选取《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为题，拟从传媒的角度，来探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对传统教育的继承和扬弃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冲突、交融、整合中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教育并不是一成不变顺理成章地被传承和延续。西方文化和教育也不是直接移植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里，有着过多的矛盾、冲突和纠葛。而这些矛盾的产生、激发、争论、化解，都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和作用。教育制度的变革、教育观念的更新、教育运动的兴起，都有大众传媒的身影和力量。从科举制度的退场到新的学制的建立、从高校管理的不完善到高校事务的规范化、从学生学潮的兴起到教师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政府与学校、政治与学术等各种大小的高等教育问题都有大众传媒的关注和参与。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也是其社会职能逐步觉醒和增强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能仅囿于教育内部而得以实现，也不会自发形成、一蹴而就。它需要更广阔的社会舞台，需要唤醒、激发和鼓动。这离不开传媒的作用。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大众传媒的结合，使教育产生新的情形：一是公共性。大众传媒的参与使教育越出了自身的范围，而形成了一个公共关

^① 熊明安编著. 中国高等教育史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3: 2.

系。大众传媒的参与使教育活动和教育事件并不单纯是教育自身内部行为，而变成有着更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和行为。大众传媒的参与也促使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共同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大众传媒与高等教育的结合，还形成了一个教育公共领域或教育公众舆论领域。它独立于教育权力机关之外，甚至与权力机关相抗衡。这一公共舆论力量不可低估。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舆论是社会秩序基础上共同公开反思的结果；公众舆论是对社会秩序的自然规律的概括，它没有统治力量，但开明的统治者必定会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见。”^① 二是增殖性。大众媒介借助于先进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而且其传播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只要接触大众传播信息的受众，不分年龄、性别、地位、职务等都是其传播的对象。通过这种大量而广泛的传播实现其强大的增殖力量。所以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人体的延伸”。^② 原本一项教育活动、一个教育行为，由于大众传媒的参与而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也就为更多的人所评判，其影响也就大为扩大。而其他传播渠道只有经过极大的努力才能增殖。因为信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朝单方面流动，而大众传播媒介则不同，它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在多方面发生影响。所以施拉姆说：“大众传播媒介在历史上对国家发展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们是伟大的增殖者。正如工业革命中机器能以其各种动力倍增人的能力一样，传播革命中的传播机器同样可使人类的信息增殖到前所未闻的程度。”^③ 三是感染性。报纸是人们情绪的一种发泄。大众传播媒介非常具有情绪性和感染力。它可以激发人们的情感，唤醒人们的理想，提高人们的期望。人们在这里也可以发泄不满和愤懑。在中国近代社会，大众传媒承载并表现了高校教师、学生、管理者、报人等人的理想和情感。大众传媒的渲染和颂扬，能激发人们的一种情景期待，希望他人、教育、社会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发生改变。四是连续

① 哈贝马斯.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观念与意识形态 [A]. 哈贝马斯著. 曹卫东译. 哈贝马斯精粹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75.

②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 [A]. 张国良主编. 20 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374.

③ 韦尔伯·施拉姆著. 金燕宁等译. 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 [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95.

性。报刊定期发行的特征,也使得教育在向大众展示时富有连贯性。一方面报刊要报道有关高等教育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有着极强的时效性,为当时的人及时了解教育提供直接的途径;另一方面它也有着连续性。报刊的连续出版使得对于事情的报道能连续不断。这与杂志有着极大的不同。它也为后人保存了一份历史的真实记录。五是趣味性。报刊尤其是民办报刊,要得到读者的欢迎,必须能满足读者的需要,符合公众的趣味。报纸的这种特性也使得它关注高等教育的人情底里、内幕人脉。它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换了一种角度和心情。它也使得教育呈现出人性人情的多面性,使之更鲜活而富有生机。

同时大众传播媒介在高等教育的参与和推进中,自身也得到了发展。高等教育作为媒介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丰富了它的内涵,提升了它的文化品格。大学教师广泛参与大众媒介,也使大众传媒得以丰富和深化。大众传媒在模塑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同时,其自身也被高等教育构筑和塑造。

因此,在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意义的同时,更需要充分认识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对于教育的意义。在这里,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载体而存在,而且也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本体而出现。它既是高等教育存在的物质和文化条件,又展示着媒介的教育意义和力量。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源,它带来了一种新质教育。当人们认识到大众传媒对于社会进步和民族精神重塑的价值时,一种新的价值尺度随之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大众传媒引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不仅是研究视角的变化,而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理论的重新认识和再建构,是从一个特定的理论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这一独特概念的梳理和认识。毫无疑问,大众传媒在形成教育公共领域、改变教育传播方式、造就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产生新的教育体制、增强学生责任意识、借鉴和融合外国教育经验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教育精神的改变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将大众传媒引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其意义还在于打破将教育囿于封闭的体系内而自我论证的情形,从而在大众传媒与教育关系的更广阔

的视野中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二、选择《大公报》作为切入点的原因及其已有研究成果

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①。而对媒介的理解则有多义性,有的说语言、文字是媒介,也有的说报纸、杂志是媒介。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出版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是媒介。概括起来说,媒介其含义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它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第二,它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②

大众传媒或大众传播媒介则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战后才出现的电视)。^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也就是大众传播,只是研究的视角各有侧重。前者更注重载体,而后者更注重过程。但二者都是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众、传播效果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综合体。

参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众传媒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类:一为政党主办的报刊。如《中央日报》等,这类报纸对于教育的重大事件、教育政策等给予报道,但不能广泛地反映民意。二为民办报刊。我国最早的民报为同治十二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清末以来主要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苏报》、《申报》、《津报》、《大公报》等。它们对教育给予及时关注,有的通过时事要闻及时报道,有的辟有教育专

① 郭庆光著.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47.

② 郭庆光著. 传播学教程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147.

③ 威尔伯·施拉姆, 威廉·波特著. 传播学概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4: 2.

栏。由于是民办报纸，往往注重民意，考虑读者趣味，开设读者来函专栏等。三为专业性教育报刊。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这类报刊专门对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但专业性强，社会参与性弱。

大众传媒浩如烟海，以笔者的精力和水平难以全面把握，只能有所取舍和选择。之所以选择《大公报》作为研究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关系的切入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一）《大公报》的办报时间长。《大公报》从1902年6月17日开始创办，至今还仍然活跃在传媒界。它是中国至今唯一的一份存活了百年的报纸。其发展可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902年6月至1916年9月英敛之时期；第二时期为1916年9月至1925年11月王郅隆时期；第三时期为1926年9月至1949年1月新记《大公报》时期；第四个时期为解放后的《大公报》至今。这篇论文主要研究1902年6月至1949年1月天津版系《大公报》。

该报自创办之日起就对社会特别是天津、华北地区所发生的大事小情作报道和评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可以说它记载了中国社会整个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正如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为《大公报》九十八年庆典所题写的那样：“《大公报》的一百年可以涵盖中国的二十世纪；从第一期刊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无论说起始于1894年的天津中西学堂，还是起始于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可以说《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差不多同时诞生。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同成长，共呼吸，共同见证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历程。

（二）《大公报》的影响大。《大公报》自创办时起，就以“牖民智”、通民情、鞭挞权贵、批评时政而著称，很快成为天津以及华北地区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其发行量在英敛之时期曾达到日5000份；在新记《大公报》时期，1930年达到30000份。抗日战争爆发后，时局动荡，但它坚持出版，辗转于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其影响力遍及全国。1942年发行量突破50000份，1947年底达97000份。它也是各种社会重要力量关注的一份报纸，受到多方不同的评价。共产党人曾评价其“小骂大帮忙”，国民党人批评其为共产党的“应声虫”。批评也罢，怨恨也罢，但足以说明其